

把握客家真义

方陆著

了解客家史迹

客家學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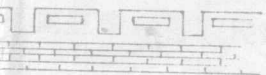
建构客家学科

弘扬客家精神

江西人民出版社

客家學概論

謝家榮



(赣)新登字第007号

K281.1

1075

书 名：客家学概论
作 者：万 陆
出 版：江西高校出版社
(南昌市洪都北大道16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赣州印刷总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3.75
字 数：30万
印 数：3000册
版 次：199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17元(国内)

ISBN7—81033—520—0

H·33

邮政编码：330046 电话：8331257、8332093、8329894

(江西高校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我虽为客家后裔，但是，象生活于今赣南东北境属县如宁都、石城、瑞金、兴国、会昌等早期客家居地的绝大多数客家后代一样，客家意识已经十分淡薄，对自己作为客家人的祖辈所知甚微，甚至于竟然反感他人偶而谈及自己的故乡也是纯客家聚居区。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客家区仅指广东兴宁、梅县，扩而充之，最多也仅及平远、龙川、和平等和赣南“三南（龙南、定南、全南）”及寻邬的交界区，而那里是充满饥荒、流亡、仇杀的恐怖之地。这不仅出于无知，还出于一种心理承受上的偏见，这种偏见显然受毒于客家人野蛮好斗，未曾开化的恶意中伤，甚至“客家非我族类”的贬损与诬蔑。此后，我进了大学，学的还是历史，但死背教科书的非科学学习方法，仍然未能点开我的鲁钝，愚昧的状况也没多少改观。由此可见，在意识领域之内，客家这一块所受“污染”之深。

直到八十年代中，我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免不了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也包括地方文献，如方志、族谱、家乘及笔记小品乃至流布民间的坊刻石印本或手抄杂录。展读这些，宋代江西的社会人文面貌，尤令我大开眼界，进而产生极大的心理震动。大量史事证明，唐初王勃虽然就已在《滕王阁序》中称颂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盛况，但那多半仅仅是就登滕王阁四境所及的赣江口、鄱阳湖湖滨地区而言，设若从江西的总体而论，那怕包括着唐以后素享“才子之乡”美誉的临川平原，或以庐陵文

化浇灌后世的吉安盆地也还是星汉寥落，未能引起世人的多少注意，王安石、曾巩，以及欧阳修这样的巨星是到了宋代才升空耀目的。至于赣南则更是“唐始有士”，未改荒漠偏僻之旧观，朝廷甚至仍然将她视为贬官、谪徙的流放之所。可是，一过五代，尤其是到了北宋，江西却横空出世，一跃而为神州之冠冕，即使赣南，也是物产丰饶，人文蔚起，渐成镶嵌于赣江源头的璀璨明珠，古虔州州治所在地的赣县县城，已成为全国三十个大城镇之一，她的造船业名列全国之首。在人才方面，这样一个山野之乡，继唐代出现了江南籍人士最早在全国性政权中荣登相位的钟绍京后，宋代的石城陈恕、陈执中父子又先后执掌真宗朝、仁宗朝的相柄，而“章贡四曾”更以人品与文品受世人钦羨，其中的曾几是陆游最为崇敬的师长。所以我当即草成《试探江西宋代文学兴盛的因由》（刊《争鸣》1984年4期），以期引发争论的兴趣。从秦始皇为营建阿房宫而派至兴国上洛山区的“木客”，到由鄱阳湖筷子巷落脚后溯赣江或沿武夷山西麓进入赣南的一批批“流人”，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理学的奠基于赣南，王阳明心学的酝酿成熟而至确立于这个佃农、伕脚起义的故乡，到文天祥的在赣州起兵勤王，杨廷麟的据赣州抗清……透过这些看来风马牛的史迹，我明显地看到了起于“五胡乱华”后大量南迁而定居于赣闽粤边的北方汉人，其中包括随司马氏南渡的“衣冠”，对这块三角地带的开发，对这一地区文明程度的推进所起的独特作用，他们在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对自身的重塑及由此熔铸的精神个性……

于是，我不能不对自己作为客家人的先祖刮目相看，并循此继进，追根溯源，探寻底蕴，求索伟力，在完成其他著

述的同时,将这些问题融入思考的界域。如果说八十年代末,我在北师大郭预衡教授、钟敬文教授身边写作《中国散文美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种理论构建上的准备,那么九十年代初的主编《赣南历代名人传》第一、二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993年出版)则是一种资料的积累与梳理。其间,我深深体会到,客家民系特征的底蕴体现于客家人的精神个性,而客家文化则是这种精神的外在表象,客家人物尤其是杰出人物的孕育成长所折射的光彩才是这种精神的代表。因此,理清客家史迹重要,观照客家人则更其重要,客家学研究应该把对客家人的研究放在极端重要的地位,将对客家精神的理解与弘扬作为学科的基点。

正在这时,客家研究日渐活跃,并步向深入。在日益增多的交流中,我的上述构想得到充实与完善,所以本书的酝酿与写作可谓深得其时,它落笔于我,实际则融汇了众多学界朋友的成果,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在这里尤应提及的是吴泽教授。当先生得知我最初的写作意向时即给予了鼓励,以后又详细询问了具体的构想,审阅了大纲细目,并欣然应允作序。只是以后由于相距千里,联系上某一环节的失措,先生的大作终未能送达。而付梓在即,为不致影响印制厂家的业务,只好忍痛将留给先生的篇首由我自己涂鸦充数。这不仅在我是一种难以弥补的缺憾,在读者也是一项重大的损失,因为缺少了导师的指引,将增添阅读上的困难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失去了开启客家学科的金钥匙。此憾,我想大家都期待着能以其他方式去补偿,先生更会满足读者的愿望,学界的祈盼。

著者 匆匆草于乙亥中秋前二日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客家研究概述	(1)
------------	-------

第一节 客家研究的起步	(1)
-------------	-------

第二节 客家研究的发展	(6)
-------------	-------

第三节 客家研究的成熟	(14)
-------------	--------

第二章 客家概念和客家学的研究对象与方 法	(24)
--------------------------	--------

第一节 客家概念举隅及评述	(24)
---------------	--------

第二节 科学界定客家概念的理论基础	(32)
-------------------	--------

第三节 客家学的研究对象	(38)
--------------	--------

第四节 客家学的研究方法	(45)
--------------	--------

第三章 客家民系的形成与流变	(49)
----------------	--------

第一节 客家之源	(49)
----------	--------

第二节 客家先民的南迁	(60)
-------------	--------

第三节 客家民系的形成	(81)
-------------	--------

第四节 客家民系的发展	(125)
-------------	---------

第五节 客家人的播迁	(152)
------------	---------

第四章 客家民系的特征和客家人的精神个性..... (194)

第一节 客家民系的特征..... (194)

第二节 客家人的精神个性..... (238)

第五章 客家文化..... (256)

第一节 客家的生活方式..... (257)

第二节 客家的礼仪习俗..... (275)

第三节 客家的信仰..... (293)

第四节 客家的精神生活..... (317)

第五节 客家的武术和保健..... (323)

第六章 客家杰出人物..... (329)

第一节 隋唐时期..... (329)

第二节 五代宋元时期..... (342)

第三节 明清时期..... (386)

后 记..... (433)

第一章 客家研究概述

第一节 客家研究的起步

任何新学科的建立，都有赖于生活伟力之推进，有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及学科内部各个分支、门类孕育成熟的躁动和研究者学科自觉意识的觉醒。这是一种总体性的超越，也是一种时代性的呼唤。所以，马克思断言，任何观点都是“世纪”的。一种观点况且如此，一门学科当更如此。

例如文学。鲁迅曾经称魏晋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所谓自觉，也就是指文学学科意识的觉醒。其实，就历史所昭示的情况而言，这还仅仅是从诗歌学达到的程度而论，若是以小说这种被今人公认为衡量文学总体水平的代表性体裁立论，则迟至唐代才达到自觉，所以他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那么，诗歌之于魏晋又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呢？文学史、诗歌史和文学理论史至少向我们提供了如下的事实：

第一，在创作上，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面世到建安诗、玄理诗、山水诗，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均已成熟，尤其是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摸索、探求、总结，又经过近十个世纪的时间淘洗与筛选，诗歌形式已经相对稳定，犹如胎儿在母体内已度过了孕育期，期待着呱呱坠地的合适时机。

第二，在理论上，从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诗大序》到由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及刘勰《文心雕龙》组成的文学理论煌煌系列的接踵问世，绝唱迭起，不仅显示着人们对文学本体外部规律的把握所达到的高度，而且还辉映着文学家们对文学内质透彻认识的霞彩。于“诗言志”之外，人们又注意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情，从此成了诗人有意识地注入于文学——其中自然首先包括着诗歌——之体的鲜活血液。诗，真正诗化了。

第三，逝去的世纪营建着新学科的温床，将至的世纪则以更大的热情与激动拥抱新学科的登场，而这一切又都凝聚于杰出人物君临环宇、主宰文坛诗界，驱动世纪车轮的驰驱上。从屈原到三曹、三谢，他们代代相继，终于不负时代之望，于魏晋最终完成了诗学的营建。因此，在任何学科领域内，旗帜性带头人总是创建新学科艰巨历程的开路先锋。

如此说来，学科自身的实绩，学科自觉意识的觉醒，学科带头人的代代相继当是新学科建立的不可或缺的三大必要条件。那么，客家学呢，为准确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客家问题的研究作一简要回顾。

在客家研究史上，最早注意客家问题的当推明代中叶的广东和平籍进士徐旭曾。徐旭曾于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在惠州丰湖书院执教，当时东莞、博罗两县的土客械斗愈演愈烈，生员们不明缘由问及老师，徐即召集他们，告以客家渊源及其语言、习俗特性和与杂处的土著相异处，从一个方面说明矛盾积聚乃至爆发的来龙去脉。后来，生员们将

徐氏所述记录整理成篇，并载于《和平徐氏族谱·旭增丰湖杂记》，遂成为记载客家问题的最早文献。不久，镇平（今蕉岭县）黄钊著《石窟一征》——《镇平志稿》，其七、八两卷为《方言》，系最早见于文字的客家方言实录。

接着，清代嘉应州（今广东梅州）籍人士温仲和在为故乡编撰《嘉应州志》时也溯及客家的源流问题，成为第一个将客家之名追溯到宋代“主客”编户制度的学者。他在《嘉应州志》卷七《方言》志中写道：“然以余观之……可知南宋以前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故《太平寰宇志》记载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也。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户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则是宋初至元末不及百年，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十之一二矣。……《元史·地理志》载，梅州仅户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五，主客之数已无可稽考。主客之名疑始于宋初户口册，故《寰宇记》、《九域志》所载，户皆分主客……，其后屡经丧乱，主愈弱，客愈张，至于元初，大致无处皆客。《元史》所载亦不分主客，疑其时客家之名已成，无非主之非客矣。殊不知当时所谓主者其土音有异于客否，而今皆客话，人亦概称为客家，并无所谓主者。今所编方言，即客话也。”

这一时期，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已归于失败，但它毕竟曾维持十四年，纵横九个省，不仅以雷霆万钧之力给满清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险些推倒了爱新觉罗家族的金銮宝座，而且令外国帝国主义亦胆战心惊。这场农民战争，其骨干力量即两广客家子弟，领导集团中受封为王者，除肖朝贵尚有争议外，其他均属客家。他们的英

勇顽强，实令国内外有识之士刮目相看。与此同时，随着客家地区（特别突出的是梅州地区）人口膨胀，他们在明清之际大批外迁至云、贵、川、港、澳、台，乃至东南亚、南北美洲，在异乡落地生根，经济实力亦日新月异，也使社会不能不瞩目于语言、习俗迥异于其他汉人的这一族群。其中，捷足先登者主要是客家自己的知识分子和欧美传教士。约将上述徐旭曾、温仲和等也计算在内，据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所述统计，关注并从事客家历史及其他客家问题研究的中外人士不下30人。其主要成果有：

艾特尔（E·J·Eitel）《客家人种志略》、《客家历史纲要》（见于1867年第一卷《中日访问记录》）。

皮顿（Ch Peton）《客家源流与历史》（刊《中国评论》1873年二卷四期）。

林达泉《客说》（收入温廷敬《茶阳三家文钞》卷四）。

钟用和《土客源流考》（收入著者《粤省民族考略》）。

黄遵宪《书林太仆客说后》、《梅水诗传序》（见张芝山《梅水诗传》）。

这些都可称为客家研究的发轫之作，也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批成果。他们揭开了客家研究的序幕，在世人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创之功不可没。只是由于时代和当时各学科所能达到的总体水平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局限，因而依今天的科学眼光看来，还存在各种不足乃至错误。

首先是在研究目的上的局限。如前所述，这个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是客家知识分子与欧美传教士，他们均囿于自身的

功利去探讨问题，印证成说，因而结论难免偏激。如客家知识分子一般都是为了回击土著或其他人士中对客家的恶意中伤者，证明客家并非“猺”，更不是“蛮族”与“杂种”，而是纯正的汉族正统，于是强调客家之源是“唐虞三代”与“中原贵胄”，有着高贵的血统；欧美传教士则在受到太平军史无前例的震慑之余，为自己的国家制定、调整对华政策提供咨询资料而着意探索客家人不畏强暴、英勇奋进精神的来源，强调客家人是中华民族中的最优秀者，甚至将客家说成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民族。当然，也有如日本学者中川学在《华人社会与客家史研究的社会课题》（载戴国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亚细亚经济研究所1974年版）中所披露的，欧美人最初研究客家的目的，是想激化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以削弱中国的对外力量，使自己得益。

其次，就学科本身而言，其研究对象与范围几乎完全集中于客家源流的考辨与印证上，对诸如客家概念的界定、客家形成的标志和依据、客家民系的特征等均未涉及。这样，就极大地妨碍了客家研究的深入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最后，客家问题的研究虽然是现实生活提出来的，它也确实适时地回答了现实社会中需要解答的某些问题，但它毕竟只局限于客家文人和欧美传教士的小圈子，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大众的关注，甚至在研究者之间也极少交流。因此，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不可能激起社会反响的涟漪。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才称从徐旭曾的最早言客家到黄遵宪的《梅水诗传序》面世的公元1904年为客家研究的起步期。

第二节 客家研究的发展

客家研究的发展期以罗香林教授《客家研究导论》的发表为标志，往前可追溯到1905年由《广东乡土历史》一书所引起的纷争案，往后则应延至罗香林先生于1942年《国父家世源流考》等一系列著作的发表。

客家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大环境、大气候为客家研究的推进提供的客观条件。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是时，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学术流派相继涌入中国，使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耳目一新，视野顿阔，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注入了充满旺盛生机的血液，并为诸多新兴学科的萌生提供了强大动力。统治集团的上层面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君临也不得不放松禁锢，表现出某种宽容与大度，有时甚至还附庸风雅，故作热心的姿态和支持的表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客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客家人的奋发进取，戮力开拓，其综合实力不断增长，尤其是移居海外的客家后代不但在侨居国站稳了脚跟，而且为开发和繁荣所居地作出了杰出贡献，不论在人数还是经济实力上都成为不可低估的力量。据统计，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1937年初，海外客家人口已逾4千万，其中美国约2万，加拿大3万，南美诸国1.5万，其余大部分则集中在东南亚各国。这些人中，不乏卓越人士，如爱国实业家陈嘉庚，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等等。基于这样的物质基础，相继成立的客家社团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泰国

客属总会就是其中的一个。该会在当时的暹罗内务部长亲自主持下于1930年正式成立，原名“暹罗客属会所”，首任会长杨香秀，副会长伍佐南，财政徐炎辉都是声望很高的社会贤达。然后，经过客属乡亲的共同努力，在伍佐南的筹措之下，实力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联络同侨乡谊，维持工商生计，办理学校，保管神庙，管理人口”的宗旨得以实现，至1939年正式改名“泰国华侨客属总会”，1972年又改名为泰国客属总会。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客属各级组织更为支援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富有实效的工作。类似这样的社团，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南北美洲也有。在国内，客家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对时局的发展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中，主要领导成员便是客家人，如孙中山、廖仲凯、邹鲁、张发奎、邓演达、陈铭枢、陈济棠、叶挺等，他们或以自己的高风亮节享誉中华，或以自己的卓越才能赢得国人尊敬，共同显示着客家人的族性华彩。

第三，国内外出现了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学术视野开阔，富有创见，在学界卓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其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Ellsworth Huntington公元1876年～1947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长，曾广泛游历世界各地，尤其对西南亚、中亚和我国有过多方面了解。他十分注重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人类对环境因素的适应、利用和改变。主要著作除《种族的素质》外，还有《文明与气候》、《人生地理学原理》、《亚洲的脉动》等)是世界性的人文地理学权威，他于1924年完成了巨著《种族的素质》，该书在

美国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基础上，广泛深入地汇集了世界东西方诸多民族的发展资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人类与自然环境，尤其是地域与族性的关系，为科学认识客家民系提供了理论的支撑，而且书中有不少地方直接论述了客家源流与特性，为客家研究开启了思路。该书有关客家部份由复旦大学著名优生学家潘光旦教授集结翻译为《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以单行本方式在国内出版发行。这时，国内这方面的著名学者除潘光旦外，还有顾颉刚、罗常培、李渝之以及罗香林。他们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为中心，互相配合，彼此支持，开展研究。顾颉刚是著名文献学家，文史哲兼长，他虽未直接进行客家方面的研究，写出专著，但他在古文献的考辨解释中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深有了解，对汉族各民系的洞察亦超出凡庸，因而全力支持该所开展客家研究的计划，尤其是指导后学新秀脱颖而出。罗常培（公元1899年～1958年）先生是著名汉语言学家，北京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主要成就在音韵学、方言学、少数民族语言学和语音学等方面。他于1940年出版的《临川音系》虽不是客家方言专著，但他先从客家人的历史迁徙路线与江西临川的关系，再从语音方面比较临川话与客家话的异同，把临川音与北京音“切韵”分割作了比较，因而颇多启发。此后，他又在《语言与文化》中更直接地指出应“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这对把握客家民系的语言特征更具指导意义。

毋庸讳言，最早系统研究客家历史源流并且成绩斐然的当推罗香林先生。

罗香林（公元1906年～1978年）字元一，号乙堂，广东

兴宁人。他于192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文学系，师从王国维、梁启超、朱希祖、陈寅恪、顾颉刚诸大家。1930年秋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同时兼肄业燕京大学研究院，并获该院荣誉奖学金。他在专攻唐史与百越源流之余，又受燕大国学研究所委托，编辑出版《客家史料丛刊》，接着又与美国史蒂芬博士赴粤东考察，不顾辛劳，跋涉于东、北江各地。当时，由于正值土地革命战争在赣南、闽西轰轰烈烈开展之际，他虽未能深入闽赣，但仍千方百计，搜集资料，作总体研究。经一年多的努力，他在全面总结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索及调查所得，在1933年写出了今天被学术界公认为了解和研究客家问题者必读的经典性著作——《客家研究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导论》共九章，计25万字，集中系统地论述了客家源流等问题。其中第二章“客家的源流”及第三章“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是该书最突出的篇章，经著者修订、补充，1950年又以《客家源流考》之名首刊于《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罗先生在完成《导论》后，又于民族危亡之际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接连写出了《汉族的构成》、《中华民族的长成与发展》、《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家世考》、《国父家世源流考》、《客属海外各团体之组织与发展》等一系列有关客家的论著，不仅完成了这一时期内整个客家研究的突破与超越，他自己也成此中一代宗师。

正是有着上述三方面的有利条件，才铸成了这一时期客家研究的下列三大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但由现实的生活所提出，而且始终和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不但触及广大客家人士，而且